

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 ——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

吳佩珍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真杉靜枝於一九〇〇年出生於日本福井縣。三歲時，與擔任神官的父親真杉千里及家人一起定居台灣。二十一歲時，聽從父母安排結婚，但無法忍耐婚姻生活，離開台灣投靠大阪的祖父母。之後，成為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結識武者小路實篤並登上日本文壇。也是少數擁有台灣生活經驗，以及以台灣生活經驗為寫作題材的日本女性作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囑咐》以及一九四二年六月的《南方紀行》，均為反映日本「南進政策」中台灣當時位置的作品。收錄在《囑咐》中的〈南方的語言〉正反映了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一九三七年以後，台灣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國語普及化運動更積極推進的當時時代背景。

「南方的語言」的人物關係以及人物形象也反映日本領台以來語言教育政策的執行以及內台結婚問題的關係。殖民地宗主國的男性殖民者通常對被殖民者的語言政策持有掌控權，而另一方面學習殖民者語言者的被殖民者，長久以來被迫定位於「學舌」的次元。但是在〈南方的語言〉中的人物「阿花」（木村花子）與本島人丈夫「李金史」的重層語言構造關係所反映的殖民地語言政策問題，不但脫離了我們當時對殖民地語言政策印象的常軌，也反映了性／別問

題，內台結婚問題與語言政策執行的密切關係。本文將以真杉靜枝的〈南方的語言〉為中心探討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性／別問題以及內台結婚問題之間的相關性。

關鍵詞：真杉靜枝、語言政策、內台結婚問題、皇民化、性／別問題

Th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Movement of the Imperial Subjective and the Marriage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Along Masugi Shizue’s “the Language of the South”

Wu Pei-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hoochow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Masugi Shizue is few of the Japanese female writers who possesse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and creates her works based on her life experience in colonial Taiwan.

“The Language of the South” is one of them reflects the language policy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zation as well as the issue of the Inter-racial marriage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In general, the male colonizers dominate the power of language. On the contrary, the colonized have been forced to pick up the language of the colonizers and achieved nothing but mimic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e colonizer’s language.

However, the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Kimura Hanako and Ree Kinshi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outh” indicates more complicated layer in colonial language polic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hrough analyzing this work, this paper will shed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eriod of the

imperial subjective, the gender issue and the marriage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outh”.

Key words: Masugi Shizue, the language policy, the marriage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the movement of the imperial Subjective, gender issue

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 與內台結婚問題

——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¹

一、序論

真杉靜枝於一九〇〇年出生於日本福井縣，三歲時隨擔任神官的父親真杉千里赴台灣，廿一歲時在父母安排之下結婚，但由於無法忍受父母之命的婚姻生活，之後便離開台灣投靠大阪的祖父母。爾後進入大阪每日新聞擔任記者，因此結識武者小路實篤，進而開始從事寫作登上日本文壇，是少數經歷台灣生活並且以台灣殖民地生活經驗為寫作題材的日本女性作家。

進入日本文壇之後所陸續出版的小說集，如最初的《小魚の心》(小魚的心)以及《ひなとり》(雛鳥)都受到武田泰淳等同時期日本作家的讚賞。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文壇言論自由以及創作自主性逐漸受到箝制，配合國策的作品也日漸增多。真杉靜枝所參加的「女流作家文學會」也在如此的新體制下被收編成為政府文化部門的一部分，而真杉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所出版的《ことづけ》(囑咐)以及一九四二年六月的《南方紀行》二部作品均為反映日本「南進政策」中當時台灣日益重要的戰略地位。被貼上「國策小說」標籤的這些作品，與大部分國策小說的遭遇雷同，幾乎都為人所遺忘，而真杉靜枝所為人遺忘的不只是這些作品，還有她在文壇所曾留下的痕跡。

¹ 本文依會議發表論文原稿〈皇民化時期の言語政策と内台結婚問題—真杉静枝「南方の言葉」を中心に—〉(東吳大学日本語文学系「2007年日語教学国際會議」,台北:東吳大學)翻譯以及大幅修改後定稿。

一九三九年真杉靜枝與中村地平訪台²，之後一九四二年五月到六月間在配合軍方政策之下與佐多稻子等組成新潮班（隸屬新潮社）至上海、南京、蘇州等中國各地的日方戰區進行訪問。由《ことづけ》（囑咐）以及《南方紀行》所收錄的作品題材均以此時期訪問台灣以及中國南方時的見聞創作居多。

〈南方的語言〉收錄於《囑咐》，該書復刻版的解說部分對於《囑咐》當時的出版背景作了如下的介紹：「在日本南進政策的風潮下，此時期以南方為題材的作品大量發行，而此作品也數次再版，於一九四二年九月發行至第四刷，達三千部」³。或許《囑咐》在當時受到矚目與好評，第二年緊接著出版了《南方紀行》。真杉靜枝最初進入日本文壇時，其初期作品便以台灣內部的「日本人共同體」，特別是其中的女性生活為題材者居多。

但是其一九四〇年代初期作品集《囑咐》以及《南方紀行》的描寫對象，已經由台灣的「內地人共同體」以及「內地人女性」轉向台灣的「本島人」以及「高砂族」。真杉在《囑咐》以及《南方紀行》中所呈現的是與以往作品當中迥異的台灣表象，而寫作題材的轉變也與上述時代背景有密切的關係。

收錄於《囑咐》的〈南方的語言〉其創作年代，正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台灣正處於皇民化運動盛行，國語（日語）普及運動積極推行時期。也因此〈南方的語言〉當中的人物形像以及人物關係正反映了日本戰時下的語言政策以及成為同化政策一環的「台日結婚」問題。

從長久以來殖民地統治的慣有型態來看，掌握殖民地語言主導權的主要是宗主國的男性殖民者。而學習宗主國語言的被殖民者慣常被停滯於「模仿」、「學舌」的次元。但是〈南方的語言〉中「木村花子（阿花）」與「李金史」的

² 成為大阪每日新聞記者之後，真杉靜枝與白樺派主要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結識進而產生戀愛關係。與武者小路分離之後，與中村地平結識。1939年中村地平為新作品取材，兩人一起訪台。中村地平以牡丹社事件為題材的〈長耳國漂流記〉以及〈霧の蕃社〉（霧中蕃社）等作品都在此次取材旅行中誕生。至目前為止的研究對於真杉靜枝與男性的交友關係過度矚目，而這或許是讓她的文學作品無法獲得適當評價的理由之一。至目前為止所出版有關真杉靜枝的傳記如下：石川達三，《花の浮草》（新潮社，1965），火野葦平，《淋しきヨーロッパの女王》（寂寞的歐洲女王）（《新潮》，1955年1月號），十津川光子，《惡評の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悲しみの生涯—》（惡評之女——一位女性作家的悲喜生涯）（虎見書房，1968）以及林真理子，《女文士》（新潮社，1995）。

³ 河原功，〈真杉靜枝『ことづけ』解説〉，《ことづけ》（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

內台結婚關係當中所呈現的卻是重層的語言構造，而非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強制學習宗主國語言的典型模式；當中可見殖民者（木村花子）對於被殖民者語言也能自在操縱的描寫。因此，此作品與當時流行的殖民地語言政策官方宣傳般的「國策小說」有迥異之處。此外此文本當中「日台結婚」的設定和描寫，與當時皇民化運動當中常見的知識份子階層通婚類型也完全不同。透過女主人公「木村花子（花子）」的人物設定與描寫，真杉靜枝維持其自初期作品以來一貫的性／別意識，此外也突顯了性／別意識問題與內台結婚，以及與國語政策施行的密切關係。本文將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試論此文本中浮現的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以及其與內台結婚的相關性問題。

二、來自「殖民地台灣」的女作家，描寫「殖民地台灣」的女作家

真杉靜枝自處女作品集《小魚の心》（竹村書房，1938）開始，便多取材自「台灣」而登上日本文壇。《小魚の心》當中所收錄的短篇小說如〈南方の墓〉〈南海の記憶〉都是描寫由內地渡台的內地人女性。這些作品所呈現的台灣殖民地中的內地人社會是八方閉塞，所謂「『殖民地』＝『女性墳場』＝『黑暗世界』」的慘澹狀況⁴。真杉靜枝在此時期所描繪的台灣殖民地內地人女性生活，的確是極其悲慘以及受到家父長壓迫的。此外，真杉所描繪的並非日本高級官僚、技師群聚的都會台北，而是偏僻的台灣中南部。例如〈南方の墓〉的舞台是她第一次結婚後所定居的「舊城」（現今的左營），而〈南海の記憶〉則是台中與高雄。「只要有鐵路的地方便會有站長的道理一樣，無論是怎麼樣偏僻的鄉下部落，都會有內地人警官進駐。只要一張派令，無論怎樣的窮鄉僻壤，這些人都得去」⁵。從此段引文我們可窺見，真杉在初期作品中所描寫的女性是以從事鐵路工作或是警察等下級官吏的妻女居多。在此日本人共同體中「（殖民地官

⁴ 李文茹，《帝國女性と植民地支配》（名古屋大學人間情報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頁 22。

⁵ 〈南方の墓〉，《小魚の心》（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 年 9 月），頁 291。

吏)宿舍的丈夫們毆打妻子已經成為家常便飯」⁶。「宿舍的太太們，只要不是太蠢的，幾乎都會遭到丈夫的毆打」「只要跟人說『我又把老婆揍了一頓』，這個丈夫在男人群中的地位便會高上幾分」⁷。

從真杉靜枝這些早期作品當中可窺見台灣下級官吏的內地人社會中，女性所遭受的家庭暴力、階級以及性／別劣勢的壓迫。在〈南海の記憶〉當中，從東京與男畫家私奔到高雄「曾經美麗的夫人」，在歲月的摧殘下，「已經完全褪色，忘卻上妝的雙頰，已變成台灣隨處可見的土色而且失去潤澤」⁸。位於帝國邊緣的台灣，正代表著承受家父長壓迫以及從內地核心脫軌所謂被邊緣化的女性們的命運。但是隨著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南進基地」台灣重要的戰略地位再度受到矚目，也因為如此，真杉靜枝描寫的台灣也因此有了變化。然而出現於真杉靜枝早期作品的女性問題以及結婚問題意識仍然在「國策小說」時期的作品當中可見到。

三、内台融合的象徵——「南方的語言」中的阿花（木村花子）⁹

十九世紀之後，日本領土擴張的慾望反映於其「南方憧憬」的論述，而台灣正是其所投射的影像之一。由於日本在甲午戰爭贏得勝利，一八九五年之後台灣便成為日本帝國領土的一部分，此後成為帝國邊緣者逃亡地帶的「化外之地」表象¹⁰。而如前面所敘述的，隨著中日戰爭的白熱化，台灣在帝國中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再次成為注目的焦點。而皇民化運動以及國語普及運動也在

⁶ 〈南海の記憶〉，《小魚の心》（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頁202。

⁷ 〈南方の墓〉，頁289。

⁸ 同註6，頁210。

⁹ 阿花是木村花子台語名的發音，收錄於《ことづけ》（囑咐）的〈南方的語言〉中，阿花的假名注音為「アーホン」，但較接近正確發音者應為「アーホイ」，此處遵循原始文本。

¹⁰ Faye Yuan Kleeman 指出了在菊池幽芳的《己之罪》（1899）以及島崎藤村的《新生》（1918）中，台灣成為「不幸者」以及「墮落者」逃亡目的地的表象。《己之罪》中的箕輪環曾經產下私生子，因而隻身遠渡台北充當護士以彌補己罪。而《新生》當中的節子因為身懷叔父的孩子而被家人送往台灣。參照阮斐娜著，吳佩珍譯，〈目的地台灣！日本殖民時期旅行書寫中的台灣建構〉，收於陳芳明編，《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文建會，2007年7月），頁321-322。

此時代背景之下積極推展，〈南方的語言〉可說是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自事變以來，在積極推展台灣皇民化運動，而警察以及公務員也都以日本的國語與人民應對」（頁 6）。以女主人公阿花（木村花子）為中心，作品的登場人物關係圖如下。

內地人	^{アーホン} 阿花（木村花子）	本島人
巡查		李金史（丈夫）
相關官員		老婦（婆婆）
吉川ミツ子（公學校老師）		
郡守		

〈南方的語言〉的故事大綱如下。某日巡查與郡的官員來到南部某部落進行戶口調查。李家的媳婦^{アーホン}阿花（木村花子）出來接待巡查官員們。由外表看來阿花完全是台灣本土女性的模樣，但是她「習自東京的優雅國語」（頁 8）讓官員們吃了一驚。對她進行身家調查之後，才發覺她本名為木村花子，是來自東京的日本女性。因為在日本婚姻失敗，為了投靠青梅竹馬的好友，漂洋過海來到了台灣。但友人卻因為丈夫出征後一病不起，正在街頭徘徊迷惘時，剛好坐上了車夫李金史的車子。因此兩人便結了婚，木村花子就此滯留在台灣南部偏僻的鄉下。而也因為如此，花子的婆婆也在「國語教習所」努力學習日語。甫自大學畢業來巡視的郡守對學生們提出問題時，她是唯一能以日語對答如流的。丈夫李金史在日常生活當中幾乎都使用日語，也愈來愈流利。但某日，老婦在路上為水牛衝撞因而身亡時，李金史在過度傷痛的情況下以台灣話咒罵：「幹你娘！」，同時木村花子也留著眼淚邊安慰著他。

由故事大綱可看出這篇小說是配合當時國策風潮，透過描寫當時「國語」運動的普及以及「內台結婚」，呈現當時全力推動皇民化運動下的台灣。女主人公木村花子（^{アーホン}阿花）與之前殖民地文學作品所出現的殖民者形象迥異，她不僅融入了本島人的生活也能夠流暢地使用台灣話。而這從木村花子一開始的描寫便可得知。

「^{アーホン}阿花」，從土牆圍繞建築的台灣人家中，傳來老婦的呼喚聲。

「啥米回？」……

被稱作^{アーホン}阿花的女性年約二十六七，有雙丹鳳眼，是傳統的東方美人。穿著露出腰身的褲子以及呈現胸部豐滿曲線的貼身上衣。……拖著木屐的腳上沾滿豬的餌食，但阿花不以為意，連忙朝呼喚聲傳來處奔去。

「巡查來普查戶口，已經來到隔壁了」。^[老婦]用台灣話飛快地說著，而阿花似乎漫不經心地聽著，邊回答著是嗎，一邊收拾豬食的桶子。(頁 4-5)

由引文可知^{アーホン}阿花無論是其語言表現或是身體描寫，完全展現了鄉下「本島人女性」的形象。但木村花子知道對於來作戶口普查的長官們已無法繼續隱瞞自己的身分。她以與她氛圍大相逕庭的優雅日語對長官們說道：「請上座」時¹¹，來訪官員們「面面相覷，均浮現詫異的表情」，「在臺灣南部如此的小鎮上，居住的內地人口寥寥可數。此刻傳入長官們耳中的『請上座』這樣東京地域的優雅日語，是這兩天到各處進行戶口普查時，聽都沒有聽到過的」(頁 8)。官員們對木村花子「優雅」日語的反應，說明了以下數點。首先是當時定居台灣南部的內地人當中，東京出身者是屈指可數的。日本移民在當時典型的形象是：生活無以為繼的「敗北集團」，就如同一九三六年第一屆芥川賞得獎作品石川達三的《蒼氓》中，所描繪的移民巴西的日本人形象一樣，幾乎都是飽受經濟壓迫，偏僻鄉村的出身者¹²。而由日語力學所構成的階級構圖中，不僅有著宗主國（日語母語者）對殖民地（日語學習者）／日本內地對台灣的關係構造，也可看帝國核心當中，東京（標準語）對地方（方言）等同於上對下的力學構造。

戶口普查官員的一番話：「既然出身東京，那你為何在如此偏僻之地生活呢？無論怎麼看你就是個台灣人」(頁 9) 清楚地顯示東京出身者在內地人當中有著所謂來自「帝都」的優越感。從木村花子的自述，我們可以知道她不僅畢業自東京的女子學校，同時出生於「東京築地的歌舞伎座後面的本願寺附近」

¹¹ 此處原文為：「どうぞ、おかけ遊ばし」。在日語當中表尊敬鄭重之意。參照《廣辭苑》。

¹² 川村湊，〈移民と棄民—移民文学論序説—〉，《国文学》（至文堂，1990年10月）。

(頁 10)，並曾在此處渡過結婚生活。築地本願寺在江戶時期(1617)興建，於明歷三年(1657)因明歷大火燒毀，重建之後再度因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而毀損。昭和九年(1934)再度重建，外觀為印度樣式，內部的祭壇則為安土桃山時代的建築物¹³。而歌舞伎座於明治二十二年(1889)開場當時，是最具代表性的西洋樣式建築¹⁴。當時東京最具代表性的二座建築物可說是以最具現代性的圖騰象徵木村花子這位來自摩登帝都的內地女性。

台灣窮鄉僻壤的「本島人女性」阿花的形象與她原自的出身相隔懸殊，也因此使得進行戶口普查的官員們難掩驚訝。因為從阿花身上可看見呈現了語言(正統東京國語)與人種(本島人)的分斷性，但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四、木村花子與李金史的「內台結婚」所反映之時代背景： 「國語普及」與「同化運動」

當官員們問到木村花子為何來到台灣南部以及為何與本島人人力車夫的李金史結婚時，她如此答道：「並無有特別的理由。非常平常地，只因為我愛我的丈夫李金史」(頁 9)。根據木村花子的自述，她與李金史的婚姻乍看之下似乎只是單純地基於「愛情」的結合，實際上二者結合的設定正反映出以同化為目的當代「內台結婚」宣傳的要素，同時並與「國語普及」以及「同化運動」緊密地結合。木村花子從女校畢業之後便在東京結婚，爾後因婚姻失敗生計無以為繼時，便遠渡到台灣，打算依靠朋友。但因朋友過世而徘徊街頭的她，此時坐上了李金史的人力車，「一乘上車，他好的出奇的國語讓我誤以為他是日本人，因此不覺就將我的心事告訴了他」「我在他家中打擾約有半個月時，便興起了與他結婚的念頭」(頁 11)。

木村花子與李金史的結合是當時所流行的所謂「內台結婚」。在同時期的文學作品當中，「內台結婚」的題材已經相當流行。描寫「內台結婚」的同時代小

¹³ 關於築地本願寺，請參照下列網頁：<http://www.tsukijihongwanji.jp/> (2008年3月12日確認)。

¹⁴ 關於歌舞伎座，請參照下列網頁：<http://www.shochiku.co.jp/play/kabukiza/gekijyo/> (2008年3月12日確認)。

說有庄司總一《陳夫人》(1941~1943)，坂口禰子〈鄭一家〉(1941)等。因此可知內台結婚顯然地成為宣傳「同化運動」的一環。特別是《陳夫人》，曾經由森本薰以及田中澄江改編劇本成為五幕劇，同時由久保田萬太郎導演，自昭和十六年(1941)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四日為止在東京上演。以南進基地台灣為舞台在東京上映的新劇恐怕是第一次。「這齣戲對於帝都的新劇劇迷達成了啟蒙的效用。(中略)內台結婚以及異族通婚、進入台灣的社會，特別是以妻子身分進入的設定，是極為複雜且沉重的課題。但是對作家而言，這似乎是能挑起創作意欲的主題。」¹⁵以〈陳夫人〉為例，從中可看出一些端倪是，當時〈陳夫人〉成為文學作品當中以內台通婚為題材的契機，並帶動這個題材流行的風潮。

但是從前述的幾個以內台結婚為題材的作品，可看出是以台灣男性知識份子與日本女性結合的模式居多。此外如台灣人男性作家龍瑛宗所描寫的，對台灣男性知識分子而言，與日本女性結婚不僅是社會階級的象徵，也能夠獲得實質的利益。¹⁶在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改造》1937年4月)當中，台灣男性對內台共婚所抱持的憧憬有如下的描述：「或許那是虛幻的願望，如果運氣好，我想與內地人女性結婚談戀愛。而內台共婚法不是因為這樣才公佈的嗎？不過如果結婚的話，還是入贅的好。戶籍上如果成了內地人的話，公家機關便會加薪六成，加上其他的補貼，是很有利的。不不，就算將現實的功利考量置之度外，如果能跟無比柔順，兼具教養而且美麗如花的內地人女性在一起的話，自己就算減壽個十年二十年也毫無怨言」¹⁷。此處明顯可看出對台灣男性知識分子而言，與「日本女性」結婚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出人頭地」。

但當時內台結婚的實際情況，由下列與臺灣人結婚的日本人女性的訪問實錄也可窺見一二。

¹⁵ 〈內台結婚の《陳夫人》上演〉，《殖民地台灣の女性生活史 昭和編(下)》(田畑書店，2001)，頁167-168。

¹⁶ 關於此觀點，將「日台結婚」描寫成為「日台融合」象徵的內地人作家是不同的。二者異同的比較研究，將待後稿再詳述。

¹⁷ 〈パイアのある街〉，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三卷(東京：綠蔭書房，1999)，頁26。

醫學士許章夫人宇野繪 29 歲「只有風俗與語言是與本島人迥異的，人情方面絲毫沒有不同。與丈夫的伯母也熱絡地以台灣話交談。因為和服不經濟，所以我最喜歡台灣服，總是穿著台灣服」。¹⁸

從上述嫁作台灣婦的日本人女性的發言當中可見到其已經完全融入了本島人的生活，〈南方的語言〉其中一節與上述引文有非常類似的構圖：「老婦對著官員們陪笑，臉上的皺紋更加深一層，並且說道：『阿花是好媳婦』。『沒關係，媽，別這麼說』，花子突然傾洩而出流暢的台灣話回答」（頁 12）。

但是如果將此篇作品與同時代小說或者日台通婚的實例對照的話，便能看出花子與李金史的結婚與當時台灣男性知識份子與日本女性結合的模式完全不同。因為李金史是勞動階層的台灣人人力車夫，而木村花子則是日本內地女校的畢業生。然而，為何如此的結合是可能的呢？第一，「語言」是首要考量的要素之一。先行研究當中指出，二者結合的可能性，「可說是殖民地以外絕無可能的偶遇」¹⁹。其中，「日語」所扮演的角色應屬關鍵。李金史由於曾經是台北銀行家官舍的專屬車伕，因此習得一口流利的日語。²⁰如果從當時國語普及運動當中，獎勵國語使用的規定來看，人力車夫的日語流暢度是被要求到達某種程度的業種之一。從作品當中對李金史的描述來看，他的日語能力正是促成二者婚姻成立的要素。

但是如從實際狀況看來，被視為「高不可攀」的日本女性「日台結婚」的例子，幾乎是與內地留學台灣男性結合居多。換言之，「內台結婚」幾乎可說是少數菁英份子的特權。從上述引文中仔細解讀木村花子的自述，便可知道其與李金史的婚姻能夠成立的真正原因還是與木村花子的出身有密切關係。

¹⁸ 《殖民地台灣の女性生活史 昭和編（下）》，頁 226。

¹⁹ 高橋留美子，〈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を読む—本島人と台湾語への愛—〉，《殖民地文化研究》第五號（殖民地文化研究會，2006），頁 167。

²⁰ 當時日台結婚的例子大多為台灣男性知識份子與日本女性結合的例子居多。如以當時的文作品當中如庄司總一《陳夫人》與坂口禔子〈鄭一家〉的例子，都是到內地留學的男性與日本女性「內台結婚」的例子。這暗示著二者的結合與的日語「洗練度」有一定的關係。

渡台的日本移民，自明治期以來便背負著負面印象。移民文學先驅同時也是知名記者的內田魯庵對於明治時期渡台日人形象，曾經如此評論道：「到台灣去的傢伙，如果是官吏的話不是被降職者便是惡評在外者，而一般民間人士不是生活困頓便是大騙子，幾乎全是披著人皮的貉。所以說，正直誠摯的工作者可說皆無。(中略)因此正人君子者大多一登上基隆，在感染瘧疾的同時，也受了台灣教〔註：暗諷台灣殖民地風氣墮落〕洗禮而墮落……」²¹。也就是說，當時一般印象中，唯有內地的邊緣者才會流落至台灣。即使如此，內地的社會階層以及壓抑構造在殖民地則再度被建構，而這樣的模式除了是我們所熟悉的宗主國對殖民地關係之外，在殖民地內地人共同體當中也同樣存在。在這樣的階級構圖下，流落至殖民地的內地人女性慣常地被貼上「性道德墮落」標籤²²，而這樣的女性形象在真杉靜枝其他的作品，如〈南方の墓〉、〈南海の記憶〉、〈阿里山〉當中也可見到。也因此，女學生出身，經歷婚姻失敗導致生活無以為繼的木村花子在性／別以及日本內地社會階級都處於劣勢，與無論是族群或社會地位都屬於下層的李金史的婚姻之所以成立，可說是帝國邊緣者的階級同質性結合。而真杉靜枝在此作品中對於木村花子因「愛情」與李金史結合的設定，與真杉在早期作品中對於缺乏「愛情」基礎的婚姻其慘澹悲哀狀況的描寫不僅形成了對比，為了從日本內部被壓抑的構造試圖逃脫，內地女性向海外逃脫卻仍難脫逃再度成為「帝國邊緣者」的命運。²³

²¹ 內田魯庵，〈台灣土産〉，《社會百面相》(博文館，1902)，頁221。

²² 移民女性的「性道德墮落」形象，與明治時期日本女性高等教育教育方針「賢妻良母主義」的逸軌者形象是重疊相關的。參照吳佩珍，〈家國意識形態(domestic ideology)的逃亡者——由田村俊子初期作品看明治期「女作家」及「女優」的定位〉，《中外文學》第34卷第5期，頁88-106。

²³ 〈南方の墓〉是其中之一例。站長的女兒對即將依父母媒妁之言結婚的唐山家女兒說道：「無論如何，婚姻是絕對不能沒有愛情的。」「居然將女兒獻給她不愛的男性，這可是多麼無情的事啊……如果女性雜誌沒有告訴我們的話，或許我們便不會注意到這是多麼無情的一件事，但是一旦意識到了，卻發現自己便是這件實驗品。」真杉靜枝，〈南方の墓〉，《小魚の心》(東京：ゆまに書房，1999〔1938〕)，頁207。

五、國語普及政策的彰顯與木村花子的共犯關係

對於提升國語政策官方宣傳效果，最顯著的部分應該是李金史七十歲老母在國語教習所勤學日語，並在郡守視察時提出的日語問題對答如流的描寫。一直以來隱瞞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木村花子，對於同是內地人的公學校教師吉川密（ミツ）子也如出一轍地隱藏自己身份。隨著丈夫李金史的日語進步，流暢無礙的同時，便打算公開自己日本人的身分，從阿花變成木村花子。

李金史日語的流暢程度幾乎讓人不認為他是本島人，因此花子自己也打算改換和服，與家中附近的人們公開自己是內地女性的身分。（頁 20）

換言之，至今為止「本島人阿花」的偽裝，隨著台灣人夫家日語水準的提昇，已經失去偽裝的必要性，也表示公開木村花子日本人身分認同的時機已經成熟。作品對於「語言＝身分認同＝國籍」²⁴的描寫可說是將台灣皇民化時期的「國語普及運動」本質構造揭露無遺。但如果語言代表國籍乃至個人身分認同的話，對於藉由語言是否真能簡單地「矯正」甚至「左右」國籍乃至個人的身分認同的可能性，在故事的結尾，以台灣語言質性的描寫，真杉靜枝提出了她的質疑。

老婦在往來的路口上被水牛給衝撞了，被抬回家中之後不到一個小時便斷了氣，也因此陷入了混亂狀態。此時，丈夫突然從外面趕回來跪倒在老母身旁撫屍痛哭，高喊著「幹你娘」！從未有如同此刻一般，讓花子覺得丈夫是如此的可親，所以想伸手撫慰他。「幹你娘」是台灣話，類似

²⁴ 關於語言與國家認同的關係，酒井直樹曾經指出：「是透過製造『外國人』的劣等意識與禁忌，以啟動本國國民同一化的規制。因此，外語習得能力的貧瘠化與近代『國民』的成立互相結合……其中『最成功』的時刻，便是國民成為帝國主義的管理者，並且獲得國民的自尊。宗主國國民（除開傳教士與殖民地統治官等例外）無需學習殖民地語言，宗主國語言與殖民地地方語言之間便被視為標準語與方言的構圖，產生了單方面學習志向的上下關係。不需贅言的，為了普及標準語，如上述般支撐學習標準上昇志向的制度化是絕對必要，而這樣的關係也在宗主國以及殖民地之間再度複製生產。在語言的選擇方面，也因為上述原因，帝國主義的力學關係也因此呈現了最露骨的開展」。酒井直樹，《死産される日本語・日本人》（新曜社，1996），頁 208-209。

日語「畜牲」之意²⁵。花子雙手環抱著不覺高聲咒罵的丈夫，流著眼淚的同時也一邊安慰著他。(頁 20)

木村花子認為日語日漸流暢的丈夫李金史已經與「日本人」相去不遠，所以即使表明自己的真實身分也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二者的婚姻雖說建立於愛情之上，但是二人的關係卻無法脫逃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力學關係的差別構造。結尾部份突然爆發的「幹你娘」這句台灣話，不僅訴盡了李金史對老母親猝死的悲慟，也突顯了改造李金史的身分認同以及族群認同的不可能性。而這句帶有陽剛氣質的「男性性」咒罵語，也可說是被殖民者企圖奪回被「去勢」的 masculinity 的象徵，同時也意味著身體底部深處的情感藉由語言表現時不由自主的「母語」流露，絕非殖民者語言教化所能「矯正」。木村花子與丈夫的愛情基礎可說是建築在「殖民者語言」上，而此時木村花子的眼淚所敘述的則是這樣的「愛情基礎」仍然不敵表現主體自我的被殖民者母語，即便透過語言的同化，二者之間仍然存在著無法消解的齟齬與鴻溝的自覺。

六、小結

真杉靜枝在創作「南方的語言」當時，在內地也宛然成為台灣文壇的代言人。「我雙親所在的台灣也可說是我的第二故鄉，也因此我對於在此(《週刊朝日》)發表文章的台灣藝術家們略知一二。無論哪一位都是我在台灣特別尊敬的藝術家們。近來，台灣距離我們越來越近，即使如此，在此發表作品的所有作家們都還是需要簡略的介紹，正說明了至目前為止內地的雜誌對他們的生疏，而這令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²⁶

這篇台灣作家介紹文中，真杉靜枝對於內地文壇對台灣文壇的生疏以及漠視提出批判，其中隱約透露出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真杉靜枝在內地文壇受到排擠甚至歧視的訊息。至目前為止的真杉靜枝研究動向，幾乎都將焦點放在她與

²⁵ 通常日語的「畜生」或許翻譯為「混帳」較為恰當，但此處為保留日語原漢字隱意，因此保留原日語漢字代替。

²⁶ 真杉靜枝，〈新銳台灣作家介紹〉，《週刊朝日》(1941年6月)。

武者小路實篤、中村地平以及中山義秀等男性文人之間的戀愛關係，而男性作家所撰寫關於真杉靜枝的傳記小說，所描繪的也大多是誇張的醜聞渲染以及過度的窺視趨向。²⁷而這些小說也為她在日本文壇被貼上「性道德墮落」標籤的事實做下了註腳。真杉靜枝以「殖民地台灣」為題材的小說中經常性地呈現殖民地台灣後進性氛圍，可說是成長於殖民地的真杉對「內地」所懷有的劣等感的一種隱喻。成長於殖民地台灣，對此出身殖民地抱有劣等感，然而卻無法割捨這塊提供自己文學養分的土地，同時也無法捨棄身為內地人的優越感，這些矛盾的混合與摻雜正是真杉文學描繪台灣時所呈現的弔詭特徵。而這些矛盾的混合體正如同我們在〈南方的語言〉中所看到的木村花子其曖昧不明的身分認同一般。

²⁷ 石川達三，《花の浮草》（新潮社，1965）以及火野葦平，《淋しきヨーロッパの女王》（寂寞的歐洲女王），《新潮》1月號（1955）正是暴露醜聞以及以窺視趣味為取向的真杉傳記小說代表。相對於至目前為止極盡攻訐之能事的男性作家所撰寫的傳記，十津川光子，《悪評の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悲しみの生涯—》（惡評之女——一位女性作家的悲喜生涯）（虎見書房，1968）則企圖為真杉靜枝復權。

